

## 《史记·西南夷列传》再研究

马宜果<sup>1</sup>, 任瑞兆<sup>2</sup>

(1.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昆明 650091; 2.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214)

**摘要:**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史家司马迁“华夷共祖”的民族史观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记述及其历史编纂的叙史原则, 不仅为后世著史确立范式, 同时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也是现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历史实践, 在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当下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 西南夷列传; 民族史观; 历史编纂; 民族史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2) 05-0040-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2.05.006

### A Re-study of Biography of Southwest Yi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MA Yiguo<sup>1</sup>, REN Ruizhao<sup>2</sup>

(1. Southwest Frontier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were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nified multi-ethnic China. The historian Sima Qian's national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and the barbarians share the same ancestor" not only established a paradigm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write history, but also reflected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community in Sima Qian's national thought. It is also a vivid historical practice of build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modern times, advocating national equality. The current society of national unity still has important mirror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iography of Southwest Yi; national historical view; historical compilation; national history thought

作为一部有关中国西南各人群集合体系统性的早期民族志,《史记·西南夷列传》从地理位置、民风民俗以及与汉王朝关系等多角度,记述了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强调了当地各民族群体积极参与到共同建立、维护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虽然说学界特别是王文光<sup>[1]</sup>、汪高鑫<sup>[2]</sup>等诸位大家对此颇多关注,论述宏深,但是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等经典民族志进行具有时代性的专文开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于有关中国民族发展史规律的认识,仍然具有

其必要性;同时也有助于当前新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高质量推进。

### 一、空间方位的框定

《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对所谓“西南夷”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明确:“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sup>[3]2991</sup>此处的“西南”,以蜀地(今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为参照点,包括当时巴郡、蜀郡的西北、西、南方向的广大地区,分布于此间的多系属群体则被称为“西

收稿日期: 2022-06-15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2022Y067)。

作者简介: 马宜果(1996—),男(回族),云南昆明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任瑞兆(1999—),女,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南夷”。中国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西南夷”的生计方式、文化类型,对居处其间的人群聚合体的社会特征、形成与发展等产生时段制约作用。

“西南夷”地区基本处于我国地形地貌结构的第二阶梯,以高原山地为主,山脉耸峙、江河穿行,大小不一的山间平坝点缀其间,气候、环境条件复杂多样,为稻作农业、旱地种植以及畜牧经济等多种生产活动的并存提供了承载空间。同时,由于地貌破碎,区域内分割特点明显,各群体之间的物质交换、文化交流受到极大限制,生活在该地区的“西南夷”创造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多样文化形态,具有自身较为独特的社会发展历程。

秦汉之前西南地区的一些族群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有的还建立了有一定控制范围的政权,如滇、夜郎等。秦汉时期郡县治理开始在西南地区推行,并逐渐深入、细密,西南方向的各古老民族群体开始快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当中。从历史角度来看,虽然西南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体在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仍长期存在,如山官制度、鼓社制度、亭目制度等都是当地社会在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与自身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同时,统治者为快速进入当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也采取了因俗而治、笼而有之的羁縻制度,通过各族群首领来实现对于当地的管理统治。这些在多向互动机制下产生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制度措施,充分反映了各民族群体发展的差异性,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多彩西南景象。而正是借助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当地各种古老族群空间方位的框定,我们才得以准确观察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下西南各民族群体流变发展的早期历史;这些文献记载本身更是被后世《汉书》《后汉书》等一众王朝时期民族史类撰述所推崇倚重,从而代有抄用,从而流传布远。

## 二、文化边界的标示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族现象本身即具有社会分类学意义,在对其进行记述描写时便伴有自发的民族识别意味。基于漫长王朝历史内容的源流传承性、文化独特性及自我意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而这种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在包括“西南夷列传”在内的《史记》民族史撰述中均有朴素的实践体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西南地区民族群体的生计方式、习俗、地望和族系之间的异同是学术界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sup>[4]</sup>。

根据司马迁所记,西南夷君长数量众多,其中夜郎最大。夜郎以西,属靡莫族类的也有十以上,其中滇的区域最大;邛都在滇的北部,这里的人们“魑结、耕田、邑聚”。同师以东,到北部牂牁,名为牂、昆明,皆编发,其生计方式为随畜迁徙,特点是“毋君长”,所居地广有数千里。牂的东北方向,君长多至十以上,其中徙、笮都地域最广。笮的东北区域,君长则亦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多至十以上,其中白马最大,他们均属氏类<sup>[5]3837</sup>。

早期西南地区的民族群体因为所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征,《史记·西南夷列传》便以其各自的生计方式、生活内容、风俗习惯作为区分标准。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各民族群体的记载,有“耕田邑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并“随畜迁徙”,以及“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和“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的四种民族群体<sup>[3]2991</sup>,司马迁对于“白马”的文化特点及族群特征没有详细的记述,但是却明确指出“白马”是属于氏族系统的群体。以今天的民族识别角度去分析司马迁的历史文本,又可以将他提到的四种类型划分为稻作农耕和游牧两种类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地区早期多种民族群体分布地域、生计方式、族群关系的划分归类,体现了朴素的民族识别意识。

我们要看到,虽然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相关记述还是基本做到了客观公正,但是由于中国王朝历史上流行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以及封建史家思想上对于所谓“四方蛮夷”一直以来或轻或重的歧视态度和全面性,特别是司马迁之后的各种民族史撰述,也要注意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更要看到,司马迁在记述“西南夷”历史过程当中所秉持的郡县治理之下的“华夷共同体”理念、将

“四方蛮夷”视为王朝国家历史不可分割重要组成部分的书写实践，不仅垂范后世，极大地影响了封建史家的著史习惯，直至今天对于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中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依然闪烁着思想认知层面上的伟大光芒。

### 三、王朝疆域拓展的西南经验

秦汉之际是传统王朝国家在之前长时期“华夷五方”不断交往交流、关系日渐密切基础上，实现“华夷”深度融合，从而版图进一步向周边拓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关键时期的四方之历史，司马迁在其《史记》特别是其“四裔传”中都有生动详细的记录，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西南方向上的展开又别具特点。《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庄蹻入滇、秦开五尺道、平定南越以及降服滇国等有关早期西南区域不断增强与中原王朝联系、快速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重要史实。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司马相如为使者，在西南地区设置了都尉、县，归蜀郡统辖。同时于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准备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然而又值北方匈奴之急，开通“西南夷”道路的计划搁置。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另派王恢出兵击讨东越，东越人杀王郢，借此之势，“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唐蒙在南越尝到枸酱，关于此物之何来，其从当地人口中得知，“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后来唐蒙回归长安，又问枸酱于蜀之商贾，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并且详细说明了夜郎的地理位置：“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sup>[3]2994</sup>之后汉武帝听从唐蒙提议，决定以兵威开拓夜郎地。唐蒙被汉武帝封为中郎将，率军备万余人，从巴蜀徼关入夜郎境内，给予夜郎侯多同大量赏赐，并封夜郎首领为侯，本次以和平方式建立了汉庭与夜郎地区名义上的统属关系：“乃且听蒙约……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为葆就”。<sup>[2]3840</sup>后来汉武帝欲打通“蜀—身毒国道”时曾派兵通过夜郎地区，夜郎还给予了支持。此后南越兵起，汉王朝本欲从当地征调军备平越。但是夜郎地的且兰部担心自身武力远离后被周边其

他族落乘虚侵入，因此联合周边同族力量兴乱反抗，并且杀死汉庭使者和犍为太守。击败南越后，汉朝八校尉在沿牂柯江南下途中诛杀且兰君主，“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遂入朝”<sup>[5]3842</sup>封为夜郎王。最终收夜郎地及其旁近众多部落实体于大一统王朝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

关于夜郎西南方向的滇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大夏归来，禀告在大夏时看到蜀地出产的布帛和邛竹杖，而这些商品通过蜀地与西南夷以远的身毒国商人进行买卖得来，两个地方距离上千里，“从东南身毒国，……患匈奴隔其道……至滇”，所以有了开蜀道前往身毒，以通大夏诸国的计划。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受命从西夷出发寻找通往身毒国的捷径，寻路过程中来到滇国，“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sup>[5]3841</sup>由于昆明族属的遮拦阻挡，最终也未能找到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但因此增加了中原地区对于滇地诸族的了解，密切了当地和中央王朝的联系，当地开始快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当中。

秦汉开西南夷，随着交通线路的掌握和开通，以及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七郡，西南地区正式进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内，汉王朝的版图也得以向更远处扩展，并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一带相连接；这不仅从政治上将西南夷地区的众多民族群体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地理上使“西南”成为王朝国家的西南和西部边疆，同时也促进了王朝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古国之间多领域的交往交流。后世文献和考古成果也都证明这一点，比如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sup>[6]177</sup>，永元九年（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sup>[6]183</sup>，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sup>[6]258</sup>；另外，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位于今云南大理的砖室墓出土有吹箫胡俑，云南保山市腾冲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发现千枚汉五铢钱，等等。对于这段早期的中外交往历史来说，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无疑是具有开创之功的。

### 四、司马迁民族史志的叙述原则

“统一多民族”是中国历史形成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格局是中国民族发展

历史的规律总结。司马迁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描述了多样的西南区域文化和当地独特的社会发展图景,并借此充分展开了当地各语言系属民族群体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快速实现与中原王朝相协调的均质化发展、开始实质性地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其民族史撰述的叙事范式和结构特点同样是开创性的,对于后世著史具有示范和指引意义。

《西南夷列传》并非单独的存在。在文本安排上司马迁有意将“西南夷”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整体叙事中进行记录。在《史记》中司马迁根据自己的入史标准,以空间为序先后撰写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个民族传记,真实地反映了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以华夏兴起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拓展并充实巩固的具体历程。而西南方向的过程内容自然也是王朝国家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有关开拓西南夷的史事选用方面,《史记·西南夷列传》突出了以各民族群体归入为序、王朝国家行政管辖的确立,表明中央王朝自古以来就在当地行使主权。首先为开西南夷而紧依巴、蜀设置了犍为郡,之后随着王朝力量深入、条件成熟,依所居处的不同族落群体而先后设置了其他六郡,“卒为七郡”<sup>[3]2998</sup>:以夜郎、头兰等为牂柯郡,以邛都为越巂郡,以笮都为沈犁郡,以冉駹为汶山郡,以白马为武都郡,最后则以最西南向的滇地为益州郡;从而为之后中央政权在当时的社会治理建立了基本的行政区划框架。正是在大一统王朝郡县治理的政治设定下,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加以册封、羁縻等制度形式对西南地区进行管理,从而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

多文化样态的互融共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自上古开始,居于“中心”的“华夏”和“边缘”的“夷狄”之间的互动关系贯穿整个王朝时期,两者主要以文化为标准进行划分,其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天下观”与“大一统”观念为“中心”与“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不断交流创造了思想和政治条件,促进了周边民族群体对中央王朝政权的多重认同,以及两者间的均质化发展,从而使得“华

夷共同体”得以形成并不断充实和巩固。司马迁以华夷“同源共祖”民族观为指导而完成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便充分呈现了居于西南地区多样生态环境下不同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融合的历史场景,具有中国民族发展的整体意识。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完全肯定了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正当性,强调了滇王“首善”、积极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历史价值:“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唯滇复为宠王。”<sup>[3]2997</sup>无疑这样的观点和思想是客观且先进的,并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司马迁的观点反映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融合中发展壮大的朴素认知。

还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虽说有唯中原视角的“他观”局限,但是基于各个民族群体“同源共祖”的兄弟情谊,在民族关系处理上着重突出了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民族史内容,在文本表述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体的尊重,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与同为正史的《汉书》《后汉书》相较,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具有的可穿越历史的人文价值。例如,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下》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sup>[5]4268</sup>,认为当地“为不毛之地,……圣王不以劳中国”<sup>[5]3844</sup>,并在行文记录中多以“蛮夷”“盗贼”称呼,范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有意突出了当地各民族群体“凶猛狡算,……西南之徼,尤为劣焉”<sup>[6]2860</sup>的特点,等等。可见两者抱有强烈的大民族主义认识,其客观性不及《史记·西南夷列传》。

## 五、结语

“统一多民族”是中国国家历史的发展主线和总体趋势,《史记·西南夷列传》作为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文本内容生动反映了西南各民族群体共同参与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表明西南各民族群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积极参与者。随着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从中原腹地派遣官吏、士卒进行治理、戍守,汉民与西南各族以及西南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发深入。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真实记录了这一社会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西南方向的民族关系是既有和平友好又有矛盾冲突的辩证运动过程,同时中央王朝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一个不断巩固和深入的历史过程。

司马迁将民族历史的编纂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之下,开创了历史书写的文化样本,其“四裔传”更为各种史书民族资料的形成树立了可供遵循的典范。以《西南夷列传》为代表的《史记》“四裔传”继承先秦以来“一统”的政治思想,凸显了夷夏关系中的统一性和融合性,树立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正统”评判标准。从民族发展史视角来看,《史记》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随后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以及西汉诸帝王本纪,在“华夷共祖”思想指导下他们与《西南夷列传》等“四裔传”一起,构建了从传说时代的初祖圣王到汉王朝一脉相承的人群集合体和文化共同体,这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态。

在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中,人们应当更加重视追溯中华民族动态发展的共同性,更加重视总结提炼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因为不断交融汇聚而

逐渐积累增长的密切联系与共同体属性,积极引导各民族从疆域、历史、文化及精神四个方面认识和理解本民族形成的起始根源和脉络过程<sup>[7]</sup>。而这也正是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等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史志进行再探讨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 王文光,翟国强.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3): 1-8.
- [2] 汪高鑫,郭倩. 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7 (4): 154-159.
- [3] 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石硕.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J]. 民族研究, 2006 (1): 59-66.
- [5] 班固.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范晔.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李艳峰. 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转换的方法论价值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2): 167-173.

(上接第7页)

#### [参考文献]

- [1] 冯黎明. 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60-64.
- [2] 河合隼雄. 孩子的宇宙 [M]. 王俊,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28.
- [3] 吴翔宇.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依据、路径与反思 [J]. 学术月刊, 2020 (7): 146-154.
- [4] 李利芳. 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 现状、趋势与方法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 167-174.
- [5]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20.
- [6] 张江. 强制阐释论 [J]. 文学评论, 2014 (6): 5-18.
- [7] 宋剑华. “强制阐释”与“文学”的缺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境之反省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 117-123.
- [8] 赵霞. 探究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路径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8-24 (02).
- [9] 舒伟.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0 (5): 41-51.
- [10] 吴其南.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转折性变革: 从“儿童本位”到“创造儿童” [N]. 中华读书报, 2011-12-07 (12).
- [11] 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M]. 吴燕莲,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2.
- [12] 赵汀阳. 第一哲学的支点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 3.
- [13] 朱自强. 儿童文学的“思想革命”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327.
- [14] 吉本斯.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学 [M]. 陈洪捷,沈文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8-25.